

比较、包容与幸福

——基于中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前恒 池桂娟*

摘要：本文使用来自中国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00多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比较方向以及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约45%的农村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会与别人进行比较。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高，比较强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进行比较的农村居民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比较参照系的比例最高，选择“邻居”作为比较方向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收入高、受教育年限长或女性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强，包容性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高。

关键词：农村居民 比较强度 比较方向 包容 主观幸福感

一、引言

Easterlin(1974,1995)的研究中把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作为解释“提高所有人收入并不能增加社会总幸福”的理由之一。此后,幸福经济学领域内的众多文献探讨了其他人收入(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其他人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时,研究者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界定其他人的边界,即参照系中的成员包括哪些人。除了Senik(2009)和采取实验方法研究居民比较行为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Solnick and Hemenway,1998;Johansson - Stenman, et al., 2002; Alpizar, et al., 2005; Carlsson, et al., 2007)外,由于没有被调查者关于参照系选择行为的直接信息,大部分研究只能采用自我假定的方法来确定参照人群^①,且参照系的收入(消费或支出)水平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总体上看,对于发达国家居民,其他人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面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居民,其他人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正面影响。表1较详细地列出了相关文献对参照系的选择情况及参照系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影

* 陈前恒,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信箱:chenqianheng@263.net;池桂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信箱:893912547@qq.com。

本文是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参会有关同仁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如一些研究假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研究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就比较低。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假设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比较参照系为同一社区的其他居民,这种假定就很难与现实情况相符。现实生活中,在同一小区居住的大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非常少,信息不对称,其他居民难以成为其比较的参照系。

响的研究结果。

表 1 相关文献对参照人群的选择情况及研究结果

文献	研究国家	参照系设定	研究结果
McBride(2001)	美国	年少5岁和年长5岁以内的人群	负相关
Senik(2004)	俄罗斯	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业、地区等个人特征变量,使用回归法预测出“像我一样的人群”的收入并把其作为相对收入	正相关
Ferrer-i- Carbonell(2005)	德国	处于同一教育水平、同一年龄段和同一地区(西德或东德)的人群	负相关
Luttmer(2005)	美国	PUMS(Public Use Micro Sample),每个PUMS的平均规模为144 000个居民	负相关
Kingdon和Knight(2007)	南非	Cluster(平均规模约2 900人)和District(平均规模约为125 400人)	正相关(Cluster),负相关(District)
Senik(2008)	欧洲国家、美国	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业、地区等个人特征变量,使用回归法预测出,并把同一职业人群的“像我一样的人群”的收入进行平均作为参照系收入水平	西欧:负相关;东欧和美国:正相关
Senik(2009)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高中同学、1989年左右认识的同事、父母	负相关
Ravallion和Lokshin(2010)	马拉维	EA(Enumerating Area)	正相关
Akay和Martinsson(2010)	埃塞	Local Community	不相关
Akay等(2012)	中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多种假定的参照系	正相关(城市工人收入);负相关(家乡农村劳动力和来自同一家乡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
陈钊等(2012)	中国	城市居民小区	正相关

然而,上述研究中暗含着三个假设。第一,其他人收入对所有样本个体的幸福感的影响是相同的,这主要体现在实证研究中的其他人收入对所有个体的幸福感影响的系数是一样的。第二,研究者一旦自我设定参照系后,所有样本个体的参照系是一样的。第三,参照系被认为是外生的。前两个假设没有反映出个体具有异质性的特点,后一个假设忽略了人们的参照系具有内生性。首先,不同个体的比较强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特别喜欢与别人进行收入比较,但也有人不太喜欢与别人进行收入比较。根据2007年的第三轮欧洲社会调查(Wave 3 of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对欧洲居民进行的“与别人进行收入比较对你有多重要?”的问题的调查结果,25%的欧洲人认为收入比较对他们“一点也不重要(设定水平为0)”,5%的欧洲人认为收入比较对他们“非常重要(设定水平为6)”,分别有15.7%、14.1%、17.1%、13.7%和9.5%的欧洲人认为收入比较对他们的重要程度依次为1至5的水平(Clark and Senik, 2010)。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比较强度,收入比较强度是如何影响幸福感的? Clark和Senik(2010)的研究表明,收入高的欧洲被调查者的收入比较强度低,收入比较强度高的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低。其次,不同个体的比较参照系(比较方向)并非完全相同。根据第三轮欧洲社会调查对欧洲居民进行的“你最可能与谁进行收入比较?”的问题的调查结果,分别有36.3%、5.8%、14.9%和7.1%的被调查者把“同事”、“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群”选作收入

比较的参照系,35.9%的被调查者没有收入比较人群(Clark and Senik,2010)。Falk 和 Knell (2004)的研究认为,人们可能出于自我提升(Self - improvement)或自我增强(Self - enhancement)的动机从而提高幸福感的考虑,会主动选择比较的参照系,参照系是内生的。Clark 和 Senik(2010)也认为参照系是内生的,人们会把与自己经常交往的人群作为收入比较的参照系,但并非出于增加幸福感而选择参照系。选择“同事”作为收入比较参照系的欧洲居民的幸福感的比较高。

Clark 和 Senik(2010)开创性地探讨了人们的收入比较强度、比较方向的影响因素及对幸福感的影响,但也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第一,他们仅仅研究了收入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现实中,人们进行比较的内容非常广泛,收入比较只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一个方面。第二,他们的研究没有涉及比较行为中的包容性对幸福感的影响。参照系里其他人过得更好的情况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也不同,有的人会变得更加高兴,有的人会变得不高兴,即个体比较行为中的包容强度具有异质性。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比较行为中的包容性,包容性强的人会更加幸福吗?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00多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比较行为对幸福的影响。本文研究采用“过日子中进行比较的强度、方向与比较中的包容性”来进行中国农村居民社会比较行为与幸福的实证研究。在中国,“过日子中的比较”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比较内容的指标,不仅包括收入方面的比较,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比较。本文研究目标如下:第一,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及比较强度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二,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方向及比较方向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三,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中的包容性及比较中的包容性对幸福感的影响。

本项研究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村居民的行为。本文可能是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比较行为。第二,本文认为,在解决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以避免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一方面需要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需要提高中国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包容别人过得更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也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的研究对于制定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以提高中国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以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文章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提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强度、比较方向和比较中的包容性强度等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说明;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依次探讨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比较方向和比较中的包容性的影响因素及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七部分是结束语。

二、理论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主要建立在 Clark 和 Senik(2010)、Hirschman 和 Rothschild(1973)的研究基础上,本文的贡献是在分析中加入了比较行为中的包容性对幸福感影响的探讨。

假设第 i 人的幸福决定函数如下:

$$U_i = U\{u_1(y_i), u_2[l_i - l(r_i)], u_3(Z_i)\} \quad (1)$$

(1)式中,第 i 个人的幸福 $U(\cdot)$ 由 u_1 、 u_2 、 u_3 三个幸福函数组成。 y_i 表示第 i 个人的绝对收入, $u_1(\cdot)$ 表示绝对收入对第 i 个人的幸福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的特性。 $l(r_i)$ 是第 i 个人所在的参照系 r 的平均生活水平, $u_2(\cdot)$ 表示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对第 i 个人的幸福的影响。 Z_i 为一组表示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特征的向量, $u_3(\cdot)$ 表示社会经济因素、人口特征对第 i 个人的幸福的影响。

如果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其他人的生活水平通过比较强度和一般的函数形式 $f(\cdot)$ 影响主观幸福感,第 i 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决定函数可以表述为:

$$SWB_i = \alpha y_i + \beta_i \cdot f[l_i - l(r_i)] + \lambda' Z + \epsilon_i \quad (2)$$

(2)式中, SWB_i 表示第 i 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α 是绝对收入对第 i 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 β_i 是第 i 个人的比较强度,直接表示其他人生活水平对第 i 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λ' 是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特征等向量对第 i 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一组影响系数; ϵ_i 为误差项。

根据(2)式,如果一个人是爱比较(比较强度高)的人,只有当 $f[l_i - l(r_i)] > 0$ 的情况下,他的幸福感才会更高;而当 $f[l_i - l(r_i)] < 0$ 时,他的幸福感会更低。因此,比较强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方向还不确定。

理论上, $f(\cdot)$ 的符号并不确定。首先,依据 Runciman(1966)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或嫉妒理论,个人的生活水平减去其所在参照系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净值越大,幸福感越强,即 $f'(\cdot) > 0$ 。如果参照系中其他人的日子变得更好时,即 $l(r_i)$ 变大、 $l_i - l(r_i)$ 变小,个人的幸福感将变低。如果一个人持“知足者长乐”的思想或出于提高自己幸福感的目的,即主动选择向下看,意味着 $l_i - l(r_i) > 0$,他的幸福感会高一些。如果一个人的比较强度高,又选择向下看,他的幸福感会更高一些。相反,当一个人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思想,即主动选择向上看,意味着 $l_i - l(r_i) < 0$,他的幸福感会低一些。如果一个人的比较强度高,又选择向上看,他的幸福感会更低一些。第二,根据 Hirschman 和 Rothschild(1973)提出的“隧道效应”^①理论,一个人会把参照系中其他人的日子过得更好作为自己未来也将变好的预期信息。也就是说,其他人过得更好,个人的幸福感将增加,即 $f'(\cdot) < 0$ 。Hirschman 和 Rothschild(1973)进一步从理论上讨论了社会、文化、成功归因论和体制等因素对“隧道效应”强度的影响。一个社会的流动性越强,“隧道效应”越强。社会构成(民族、宗教、语言等)越复杂,“隧道效应”越弱。与现代社会相比,由于传统社会中的互惠机制强,即参照系中其他人过得更好则会给个人带来更多的礼物、贷款等,“隧道效应”就强。个人持有的成功归因论对“隧道效应”的影响比较复杂。持“别人成功在于机遇”、“别人成功在于缺点(不诚实、无耻、卑躬屈膝等)”的人很少受别人成功的影响。持“别人成功在于优点(勤奋、刻苦等)”的人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自己臣服于成功的人或把成功的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隧道效应”强;另一种情况是嫉妒别

^①Hirschman 和 Rothschild(1973)设定一个假设情景来描述“隧道效应”:如果一个人开车经过双向四车道的隧道,前方突然发生车祸而导致交通堵塞,开车的人会很沮丧。等待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位于自己前方的同向另一车道的一些车开始启动前行,他会以为前方车祸已经处理完毕,自己也会很快前行,因而会感到很高兴。然而,如果他看到另一车道的车辆一直前行,而自己所处的车道的车辆不动,会采取违规的方式试图前行,比如把自己的车强行并到另一车道。

人为什么具有这些优良品质而自己却没有,没有“隧道效应”,只有“嫉妒效应”。持“别人成功在于裙带关系、受到偏爱”的人会憎恨别人的成功。民主体制下,由于裙带关系现象比较少等原因,“隧道效应”会强一些。总体上看,参照系中其他人的日子变得更好对一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嫉妒效应”和“隧道效应”两种作用机制带来的净效应,可能大于0,可能等于0,也可能小于0。显然,如果一个人的包容性强,即参照系中的其他人过得更好时自己会高兴(“隧道效应”战胜了“嫉妒效应”,净效应大于0),会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三、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对河北、湖北、湖南、四川4个省8个县的64个村庄(4个省都为2个县各8个样本村)900多个农户(每个村庄随机抽取约15个农户)的调查。调查从2011年12月开始,持续到2012年2月底结束。农户调查主要涉及农村居民在2011年的幸福感、比较行为、收入等内容。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1. 主观幸福感

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通过以下调查问题获得:“如果评价一下2011年您自己日子过得是否满意,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为提高调查数据质量,调查组设计了一组面部表情图,每个面部表情分别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一个等级(见图1)。调查员对被调查者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时出示该图片,让被调查者进行辨认和选择。根据调查结果,928个样本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水平为6.79。表2列出了928个样本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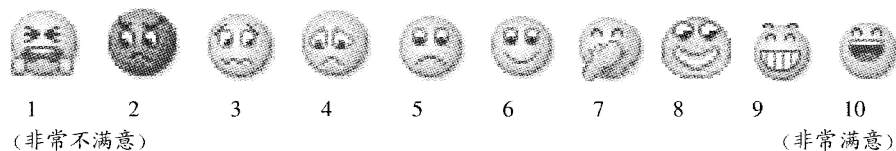


图1 代表生活满意度的面部表情等级图

表2 样本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分布情况

主观幸福感	1	2	3	4	5	6	7	8	9	10
占比(%)	1.62	1.72	2.91	4.53	16.06	16.38	13.79	25.22	7.97	9.81

2. 比较强度

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通过以下调查问题获得:“过日子中,你会和别人比较吗?”备选答案为:“1、不比”、“2、会比”、“3、经常比”。选择“1、不比”表示该农村居民比较强度低,选择“3、经常比”表示其比较强度高。共有928个农户参与了这个问题的回答。表3列出了样本农村居民比较强度的分布情况。

表3 样本农村居民比较强度的分布情况

比较强度	不比	会比	经常比
占比(%)	55.39	40.63	3.99

3. 比较方向

Knight 等(2009)的研究提及,分别有 28.62%、7.02%、39.56%、3.76%、2.71%、3.48% 和 0.93% 的中国农村被调查者把“邻居”、“亲戚”、“本村人”、“本乡镇人”、“本县人”、“本市人”和“所有中国人”作为主要的比较人群,13.92% 的被调查者没有比较人群。在中国农村地区,村民小组是农民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空间。但 Knight 等(2009)没有提及中国农村居民是否会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主要的比较人群的问题。

如被调查者在回答比较强度问题时选择“2、会比”和“3、经常比”,他们需要接着回答关于比较方向和比较中的包容性的有关问题。调查组在问卷中设置了“你最会和谁比较?”的调查问题,来确定被调查者的比较方向。备选答案为:“1、本村居民”、“2、本村民小组居民”、“3、附近邻居”、“4、亲戚”、“5、朋友”和“6、其他”。共有 414 个农村居民回答了这一问题。调查结果表明,32.85% 的农村被调查居民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主要的比较人群,没有被调查者选择“其他”选项(见表 4)。本次调查结果与 Knight 等(2009)的调查结果有所差异。

表 4 样本农村居民比较方向的分布情况

比较方向	本村居民	本村民小组居民	附近邻居	亲戚	朋友	其他
占比(%)	31.40	32.85	25.84	4.11	5.80	0.00

4. 比较中的包容性

比较中的包容性通过以下调查问题得到:“当你的比较人群中其他人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你会怎样?”备选答案为:“1、变得高兴”、“2、变得不高兴”、“3、无所谓”。选择“1、变得高兴”的农村居民被认为具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在实证分析中赋值为“1”;选择“2、变得不高兴”和“3、无所谓”的农村居民被认为包容性比较弱,赋值为“0”。共有 414 个农村居民回答了这一问题。表 5 列出了农村居民比较中的包容性的分布情况。

表 5 样本农村居民比较中的包容性的分布情况

比较中的包容性	变得高兴	变得不高兴	无所谓
占比(%)	79.23	4.59	16.18

5. 其他变量

本文主要探讨收入、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和是否少数民族等因素对比较强度、比较方向和比较中的包容性的影响。在比较强度、比较方向、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使用的控制变量则包括收入(取自然对数)、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和是否少数民族等变量。表 6 比较详细地依次列出了 928 个和 414 个样本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6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自然对数	928	8.399	1.005	2.59	10.87
	414	8.348	1.040	4.4	10.84
年龄(岁)	928	53.429	12.064	18	93
	414	53.063	11.630	18	84
性别(男性=1)	928	0.798	0.401	0	1
	414	0.819	0.386	0	1

续表6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受教育年限(年)	928	6.524	3.345	0	16
	414	6.850	3.122	0	15
是否党员(党员=1)	928	0.269	0.444	0	1
	414	0.300	0.459	0	1
婚姻状况(已婚=1)	928	0.918	0.274	0	1
	414	0.935	0.47	0	1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928	0.117	0.322	0	1
	414	0.094	0.292	0	1

(三)数据可靠性的说明

农村居民观念中,表达出爱与别人比较或别人变好自己会不高兴的看法往往是令人耻笑的。为了解决调查数据可靠性的问题,本次调查做了如下努力:第一,农户问卷调查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全部由老师和学生亲自完成。第二,坚持入户访谈,并采取一定措施防止他人(邻居和陪同的政府人员等)在调查现场干扰被调查者的回答。第三,要求调查人员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获得的信息不会被泄露。

如被调查者回答“当你的比较人群中其他人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你会怎样?”的问题选择“1、变得高兴”或“2、变得不高兴”的答案后,调查人员要求被调查者回答选择这一答案的原因。表7列出了对174个被调查者变得高兴的理由进行归类后的分布情况。表8列出了对20个被调查者变得不高兴的理由进行归类后的分布情况。

从表7和表8可以看出,被调查农村居民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Hirschman和Rothschild(1973)提出的“隧道效应”理论。这也表明,此次调查获得的有关比较强度、比较方向和比较中的包容性的调查数据是比较可靠的。

表7 “其他人日子过得比以前好,被调查者变得高兴”的理由分布情况(单位:%)

可以帮助自己,比如多借钱	榜样、有竞争、有动力	大家都好,才能和谐	说明形势好、政策好,自己也会好	其他
28.7	16.1	37.4	12.4	5.7

表8 “其他人日子过得比以前好,被调查者变得不高兴”的理由分布情况(单位:%)

显得自己没本事	自己未来会更不好	嫉妒	自己压力大
65.0	15.0	10.0	10.0

四、比较强度与幸福

(一)比较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比较强度是一个有序变量,本文选择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来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模型设定如下:

$$S_i^* = \alpha_1 + \sum_{i=1}^n \beta_i X_i + \mu_1 = \delta Z + \mu_1$$

其中, S_i^* 是一个潜在的变量,由等式右边各种因素决定。 α_1 是常数项, β_i 表示比较强度

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X_i 表示影响被调查者比较强度的因素, 包括收入(取自然对数)、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和是否少数民族, μ_1 是随机误差项, 假定服从(0,1)正态分布。

$$S_i = 1 \quad \text{如果 } S_i^* \leq \omega_1$$

$$S_i = 2 \quad \text{如果 } \omega_1 < S_i^* \leq \omega_2$$

$$S_i = 3 \quad \text{如果 } S_i^* > \omega_3$$

在 μ_1 服从(0,1)正态分布的假定下, 有:

$$\text{Prob}(S_i = 1) = \text{Prob}(S_i^* \leq \omega_1) = \text{Prob}(\delta Z + \mu_1 \leq \omega_1) = \phi(\omega_1 - \delta Z)$$

$$\text{Prob}(S_i = 2) = \text{Prob}(\omega_1 < S_i^* \leq \omega_2) = \text{Prob}(\omega_1 \leq \delta Z + \mu_1 < \omega_2) = \phi(\omega_2 - \delta Z) - \phi(\omega_1 - \delta Z)$$

$$\text{Prob}(S_i = 3) = \text{Prob}(S_i^* > \omega_3) = \text{Prob}(\delta Z + \mu_1 > \omega_3) = 1 - \phi(\omega_3 - \delta Z)$$

ω 定义为常数的集合, $\omega_1 < \omega_2 < \omega_3$ 。 ϕ 是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计算了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后发现, 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都不超过 0.5)。表 9 列出了对全部样本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

收入自然对数的系数为负, 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边际效应来看, 收入自然对数每提高 1%, 比较强度为 1 的概率上升 3.3%, 比较强度为 2 和 3 的概率分别下降 2.8% 和 0.5%。收入和比较强度呈现负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爱比较。这与 Clark 和 Senik (2010)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正,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 比较强度为 1 的概率下降 1.4%, 比较强度为 2 和 3 的概率分别上升 1.2% 和 0.2%, 受教育年限和比较强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村居民爱比较。是否党员为虚拟变量, 其系数为正, 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非党员, 党员的比较强度更高。

表 9 比较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Ordered Probit Model

变量名	系数	稳健标准误	边际效应 比较强度		
			1(不比)	2(会比)	3(经常比)
收入自然对数	-0.084 *	0.045	0.033	-0.028	-0.005
年龄	-0.006	0.004	0.002	-0.002	3.323e-4
性别(男性=1)	0.090	0.111	-0.035	0.030	0.005
受教育年限	0.0305 **	0.015	-0.014	0.012	0.002
是否党员(党员=1)	0.187 *	0.102	-0.074	0.063	0.011
婚姻状况(已婚=1)	0.076	0.170	-0.030	0.026	0.004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0.083	0.324	0.033	-0.028	-0.004
村虚拟变量			已控制		
样本数			928		
Pseudo R ²			0.1097		
卡方值			154.16		

注: **、* 分别表示在 5%、10% 的水平上显著。

(二) 比较强度与主观幸福感

研究幸福感的经济学文献主要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or Logit Model)来估计不同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Ferrer-i-Carbonell 和 Frijters (2004)指出,两种方法估计出的结果除了回归系数值有所不同外,显著性和系数的符号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由于使用 OLS 方法估计出的结果的解释比较直观,本文在探讨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时主要使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同样,本文也使用此估计方法探讨比较方向和比较行为中的包容性对幸福感的影响。

为分析比较强度对农村被调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如下:

$$SWB_i = \alpha_2 + \lambda S_i + \eta' M_i + \mu_i$$

上式中, SWB_i 表示主观幸福感, α_2 为常数项, λ 表示比较强度的回归系数, S_i 表示比较强度, M_i 为一组农户特征变量, η' 表示农户特征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 μ_i 是随机误差项。

本文将“不比”作为参照组,分析比较强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计算了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后发现,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都不超过0.5)。表10给出了全部样本的估计结果。依据表10模型1的估计结果,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比较强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根据模型2的估计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后,比较强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因此,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比较强度对幸福感的影响都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与 Clark 和 Senik(2010)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表 10 比较强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OLS

变量名	模型 1(不含控制变量)		模型 2(包含控制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常数项	6.749	0.088	3.061	1.070
比较强度(不比为参照)				
会比(会比=1,其他=0)	0.041	0.137	0.066	0.129
经常比(经常比=1,其他=0)	0.494	0.378	0.315	0.313
收入自然对数			0.258***	0.064
年龄			-0.068*	0.033
年龄平方			7.579e-4**	3.051e-4
性别(男性=1)			0.104	0.161
受教育年限			0.085***	0.023
是否党员(党员=1)			0.438***	0.136
婚姻状况(已婚=1)			0.302	0.230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0.118	0.337
村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928		928	
Adjusted R ²	0.0022		0.3027	
F 值	0.86		6.28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五、比较方向与幸福

(一)比较方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农村居民的比较方向是五种相互排斥的选择,本文使用无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比较方向选择的概率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text{Logit}\left(\frac{D_2}{D_1}\right) = \alpha_{11} + \varphi'_1 Z_i + \epsilon_{1i}$$

$$\text{Logit}\left(\frac{D_3}{D_1}\right) = \alpha_{12} + \varphi'_2 Z_i + \epsilon_{2i}$$

$$\text{Logit}\left(\frac{D_4}{D_1}\right) = \alpha_{13} + \varphi'_3 Z_i + \epsilon_{3i}$$

$$\text{Logit}\left(\frac{D_5}{D_1}\right) = \alpha_{14} + \varphi'_4 Z_i + \epsilon_{4i}$$

上式中, $D_i (i=1, 2, 3, 4, 5)$ 分别表示选择“附近邻居”、“本村居民”、“本村民小组”、“亲戚”和“朋友”作为比较方向的概率, $\alpha_{11}, \alpha_{12}, \alpha_{13}, \alpha_{14}$ 是常数项, $\varphi'_1, \varphi'_2, \varphi'_3, \varphi'_4$ 表示比较方向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Z_i 表示比较方向的影响因素, $\epsilon_{1i}, \epsilon_{2i}, \epsilon_{3i}, \epsilon_{4i}$ 是随机误差项。

表 11 列出了比较方向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收入高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和朋友比较, 可能由于收入高的农村居民大多是做生意或者外出打工的人, 所以更多的是和朋友进行比较。女性更愿意与亲戚和朋友进行比较, 这与大部分女性是村庄外来人难以融入村庄生活而更容易融入亲戚和朋友的社会交往圈子有关。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村居民喜欢和朋友比较, 这与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村居民在上学期或者工作时候认识的朋友比较多有关。党员更愿意与本村居民、本村民小组和朋友比较, 这与党员容易成为村组干部从而具有更加宽阔的社会交往范围有关。已婚的农村居民更喜欢和亲戚比较, 可能是由于结婚后亲戚之间的往来增多有关。少数民族农村居民更愿意和邻居比较, 这与少数民族聚居、与外界交往范围窄的特点有关。中国农村被调查者在比较方向的选择上与其社会交往活动经历有关, 这与 Clark 和 Senik (2010) 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 11 比较方向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以邻居作为参照组):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变量名	本村居民		本村民小组居民		亲戚		朋友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常数项	4.508	1.655	4.117	1.795	-38.225	3.567	-1.584	2.633
收入自然对数	-0.273 **	0.138	-0.313 **	0.139	-0.284	0.338	0.278	0.280
年龄	-0.004	0.014	0.012	0.016	-0.053 *	0.027	-0.040 *	0.024
性别(男性=1)	-0.028	0.385	-0.198	0.407	0.012	0.607	-0.466	0.615
受教育年限	0.040	0.048	0.026	0.044	-0.070	0.086	0.209 **	0.093
是否党员(党员=1)	0.635 *	0.328	0.360	0.338	0.314	0.796	0.139	0.610
婚姻状况(已婚=1)	-1.278 *	0.711	-1.203 *	0.703	14.798 ***	0.689	-2.118 ***	0.909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0.756	0.682	-0.372	0.696	12.995 ***	1.382	-0.328	1.222
县虚拟变量	已控制							
样本量	414							
Pseudo R ²	0.1376							
卡方值	11746.69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二) 比较方向与主观幸福感

表 12 给出了选择“会比”和“经常比”的 414 个样本农村居民的估计结果。根据表 12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选择“邻居”作为比较参照组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加入控制变量过后,依然发现,选择“邻居”作为比较参照组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

表 12 比较方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OLS

变量名	模型 1(不含控制变量)		模型 2(包含控制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常数项	6.589	0.202	1.847	1.414
比较方向(邻居为参照)				
本村居民	0.273	0.271	0.246	0.257
本村民小组居民	0.264	0.274	0.225	0.278
亲戚	0.117	0.470	0.291	0.549
朋友	1.120***	0.394	0.784*	0.412
收入自然对数			0.486***	0.101
年龄			-0.039	0.053
年龄平方			5.552e-4	5.192e-4
性别(男性=1)			-0.167	0.241
受教育年限			0.117***	0.427
是否党员(党员=1)			0.504**	0.219
婚姻状况(已婚=1)			0.517	0.423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0.810	0.524
县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414		414	
Adjusted R ²	0.0142		0.1626	
F 值	0.0853		4.32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六、比较中的包容性与幸福

(一) 比较中的包容性的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二值 Logit 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比较强度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text{Log}\left(\frac{I_i}{1-I_i}\right) = \alpha_3 = \sum_{i=1}^n \theta_i Z_i + \mu_3$$

其中, I_i 表示被调查者包容性强的概率, α_3 是常数项, θ_i 表示包容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Z_i 表示影响被调查者包容性的因素,包括收入(取自然对数)、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和是否少数民族, μ_3 是随机误差项。

表 13 列出了比较中的包容性的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收入自然对数的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收入高的农村居民包容性强。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正并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村居民包容性强。性别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女性比男性的包容性强。

表 13 比较中的包容性影响因素分析: Binary Logit Model

变量名	系数	稳健标准误	边际效应
常数项	-0.981	1.603	
收入自然对数	0.258 **	0.130	0.037
年龄	0.001	0.014	1.489e - 5
性别(男性=1)	-0.671 *	0.384	-0.083
受教育年限	0.085 *	0.048	0.012
是否党员(党员=1)	0.289	0.327	0.040
婚姻状况(已婚=1)	0.179	0.516	0.027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0.166	0.589	-0.025
县虚拟变量	已控制		
样本数	414		
Pseudo R ²	0.1224		
卡方值	47.36		

注: **、* 分别表示在 5%、10% 的水平上显著。

(二) 比较中的包容性与幸福

依据表 14 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影响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具有包容性的农村居民比不包容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从模型 2 的估计结果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仍有正影响,且其显著程度仍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虽然比较中的包容性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实际上是幸福的农村居民具有包容性,而不是具有包容性的农村居民更加幸福。或者可能存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未被发现观察到的遗漏变量同时影响了幸福与比较中的包容性,导致它们之间呈现出显著但虚假的相关,比如性格乐观的人可能同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高的幸福感。但比较遗憾的是,本文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伍德里奇(2009)认为,当工具变量不是有效的时候,工具变量估计可能比 OLS 估计更有偏。因此,本文坚持采用 OLS 估计,尽管这样估计出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有偏的情况。

表 14 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OLS

变量名	模型 1(不含控制变量)		模型 2(包含控制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常数项	6.221	0.228	2.296	1.376
比较中的包容性(包容=1)	0.770 ***	0.254	0.591 **	0.269
收入自然对数			0.465 ***	0.100
年龄			-0.056	0.052
年龄平方			7.057e - 4	5.095e - 4
性别(男性=1)			-0.140	0.240
受教育年限			0.104 ***	0.042
是否党员(党员=1)			0.490 **	0.218
婚姻状况(已婚=1)			0.421	0.398
是否少数民族(少数民族=1)			-0.812	0.532

续表 14 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OLS

变量名	模型 1(不含控制变量)		模型 2(包含控制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县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414		414	
Adjusted R ²	0.0228		0.1676	
F 值	9.17		4.99	

注:***、** 分别表示在 1%、5% 的水平上显著。

七、结束语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 4 个省 8 个县 64 个村庄 900 多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比较行为对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大约 45% 的农村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会与别人进行比较。这表明,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社会比较是农村居民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行为。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高,比较强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进行比较的农村居民选择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比较参照系的比例最高,选择“邻居”作为比较方向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收入高、受教育年限长或女性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强,包容性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高。

本文研究表明,包容性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高。这对于农村居民如何提高自己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如果农村居民要获得幸福,需要提高自己的包容性。

目前,中国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威胁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需要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如果越来越多的居民能够包容别人过得更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也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研究表明,收入高或受教育年限长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因此,要培育农村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

在研究农村居民包容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方面,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可能会出现有偏的情况,这是本文有待改进的地方。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比较行为可能与农村居民的社会比较行为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探究城市居民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比较行为并与农村居民的社会比较行为进行比较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钊、徐彤、刘晓峰,2012:《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世界经济》第 4 期。
2. 伍德里奇,2009:《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 4 版)》,中译本,清华大学出版社。
3. Akay, A., and P. Martinsson. 2010. “Does Relative Income Matter for the Very Poor?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Economics Letters*, 110(3): 213 – 215.
4. Akay, A., O. Bargain, and K. F. Zimmermann. 2012. “Relative Concerns of Rural – to –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 Journal of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1(2):421 – 441.
5. Alpizar, F., F. Carlsson, and O. Johansson – Stenman. 2005. “How Much Do We Care about Absolute versus Relativ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6(3):405 – 421.
 6. Carlsson, F., O. Johansson – Stenman, and P. Martinsson. 2007. “Do You Enjoy Having More than Others? Survey Evidence of Positional Goods.” *Economica*, 74(9):586 – 598.
 7. Clark, A. E., and C. Senik. 2010. “Who Compares to Whom? The Anatomy of Income Comparisons i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120(5):573 – 594.
 8. 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ed.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89 – 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9. Easterlin, Richard A.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7(1):35 – 47.
 10. Ferrer – i – Carbonell, A., and P. Frijters.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Economic Journal*, 114(7):641 – 659.
 11. Ferrer – i – Carbonell, A. 2005. “Income and Well – 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5 – 6):997 – 1019.
 12. Falk, A., and M. Knell. 2004. “Choosing the Joneses: Endogenous Goals and Reference Standard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3): 417 – 435.
 13. Hirschman, A. O., and M. Rothschild. 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4):544 – 566.
 14. Johansson – Stenman, O., F. Carlsson, and D. Daruvala. 2002. “Measuring Future Grandparents’ Preferences for Equality and Relative Standing.” *Economic Journal*, 112(4):362 – 383.
 15. Kingdon, Geeta Gandhi, and John Knight. 2007. “Community, Comparisons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 Divided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4(1):69 – 90.
 16. Knight, J., L. Song, and R. Gunatikala. 2009.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635 – 649.
 17. Luttmer, E. F. P. 2005.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 – be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963 – 1002.
 18. McBride, M. 2001. “Relative Income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the Cross – se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45(3):251 – 278.
 19. Ravallion, M., and M. Lokshin. 2010. “Who Cares about Relative Deprivation?” *Journal of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3(2):171 – 185.
 20.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 – century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1. Senik, C. 2004. “When Information Dominates Comparis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Using Russian Subjective Da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9 ~ 10):2099 – 2123.
 22. Senik, C. 2008. “Ambition and Jealousy: Income Interactions in the “Old” Europe versus the “New”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a*, 75(8):495 – 513.
 23. Senik, C. 2009. “Direct Evidence on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ir Welfare Effects.” *Journal of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2(1):408 – 424.
 24. Solnick, S., and D. Hemenway, 1998. “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7(3):373 – 383.

(下转第 25 页)

Price Misestimation and Marriage Market Disequilibrium

Zhang Xiaodi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the marriage market by using a two – sided search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price. When all agents are rational and price signal is not distorted, the market reaches the perfect sorting homogamy equilibrium, in which agents with similar types and categories marry within their groups. But misestimations for both oneself and others lead to disequilibrium. On the one hand, over – self – estimated individuals turn down matches of the same type. Under – self – estimated people end up in unfit marriages at an earlier time. Both kinds of inaccurate self – evaluation hav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which prevents the low – type men/women from marry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played social price may be distorted from the actual social price of an individual either on purpose or indeliberately, leading to the absence of marital market clearing. However, the misrepresented price will be gradually corrected as the time spent together increase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fades away.

Key Words: Homogamy; Social Price; Search and Match Model; Disequilibrium

JEL Classification: J12, D81, C78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 16 页)

Social Comparisons, Inclusion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en Qianheng and Chi Guij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ee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rative intensity, comparative directions, inclusion in social comparis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by using the survey of more than 900 rural residents from 6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8 counties, and 4 provinces in China. About 45% investigated rural residents compare with others in daily life. The lower income the rural residents have, 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comparison is. Meanwhile, the intensity of comparis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With respect to the directions of comparison, villagers in the same sub – village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Those who compare to neighborhoods are unhappier than those who compare to other benchmarks. Females or those who have higher income or higher education have stronger inclusion. The rural residents who have higher inclusion are much happier.

Key Words: Chinese Rural Residents; Intensity of Comparison; Directions of Comparison; Inclusi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JEL Classification: D60, I31, Z10

(责任编辑:彭爽)